

1985 年香港《中国古代书籍史》展览复制陈列品介绍

李际宁

近来，典阅组整理库房，对一批与中国古代书籍史展览有关的展品，不知所以，对其如何处理，亦成为一个难题，因向我询问。今就我所知者，回忆如下，或有助于后来者了解当年的背景与实情，对这批“展品”的来源和去向，或许有所帮助。

1984 年 10 月下旬，我刚刚从外单位调入北京图书馆（1998 年改名，对内行用“国家图书馆”名称，对外在“国家图书馆”前加“中国”两字）。11 月正式上班，还没有在组里领受工作，善本部领导即通知我到“书史筹备组”报到，同去报到的善本部人员还有金石组杜伟生、普通古籍组李炜。同时报到的还有馆群工部展览组组长胡欣、王志翔。1985 年春节过后，又加入刚调入本馆的美工陈凯彤。

报到的第一天，善本部领导李致忠先生为大家介绍情况，说 1985 年 10 月，将在香港举办“中国书展”，并说明受文化部和新闻出版局的委托，将在这次书展中，同时附设一个“中国古代书籍史展览”，作为“展中展”。北京图书馆领受筹备这个“书籍史”展览的任务，由善本部和群工部展览组合作筹备，由李致忠先生负责。

关于 1985 年在香港举办“中国书展”的背景和意义，时任出版局专员、中国版协理事陆本瑞先生撰《蜚声香港的一次文化盛会——亲历一九八五年“中国书展”实录》，有详细回顾和总结：“上世纪 80 年代中，经过中英两国政府的谈判，香港即将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，并开始进入了回归祖国的过渡期。香港作为世界金融贸易中心、东西文化交汇的国际大都市，对于沟通全球科技、文化和信息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。在这一背景下，时任国家出版局局长的边春光于 1983 年 4 月 6 日至 20 日率领一个出版代表团访问香港，我驻港机构一再表示，希望内地今后多对港澳地区开展工作，从各方面给予有力支持，并具体建议于 1985 年在港举办一次规模较大的全国书展。国家出版局于 1983 年 9 月 3 日，即向文化部（其时国家出版局隶属于文化部）请示，认为去港举办书展，不仅有利于宣传我出版工作新成就，扩大中文图书在海外的影响，而且对于全面推动我国出版事业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。”

筹备展览，重要的是确定展览的主线，并将拟展各单元的主题，尽量用实物、照片和文字表现。展览主线如何确定，要依托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为背景。

从进入“书史展览筹备组”，到 1985 年春天，按照李致忠先生的安排，筹备组所有成员

首先集中学习中国古代书籍史，学习材料是李先生刚刚出版的《中国古代书籍史》，在搭展览框架的时候，也参考刘国钧、钱存训等人的“书籍史”和相关资料。这样，边学习，边消化，边考虑展览内容，最后确定展品、图片和说明文字。最终确定展览的八个单元：1.前言；2.文字的产生于演变；3.初期书籍的产生；4.正规书籍的产生；5.书籍生产材料的伟大变革；6.书籍生产方式的伟大变革；7.中国古代书籍的装帧形制；8.古书的修复与保护。有关展览各单元的主题内容，杜伟生撰《记〈中国古代书籍史展〉》已有较详细论述，可以参考。

1985年5月，“筹备组”成员分两路，联系有关单位或个人，复制展品。以当年的制度，我们到外省、外单位联系工作事宜，首先要到馆办开具拟联系单位的介绍信。也为了一次成功，不跑“冤枉”路，我们在馆办开具的介绍信，从有关省市，直到县以下文管所或学校，比如陕西省文物厅、西安市文化局、岐山县文管所、扶风县文管所等等，开出的介绍信多达十馀通。馆办王春英老师对此高度重视，当即提笔，一封一封书写、盖章。她的字也特别漂亮，她对人和气、工作认真，给我这样刚刚进馆的年轻人留下终身的记忆。

王志翔、陈凯彤联系的一路，赴上海联系戴敦邦、贺有直等人，绘制展览需要的挂图，比如，请戴敦邦绘画了“孔子删定六经图”，请贺有直画“汉代造纸流程图”，请范增画《仓颉造字，薪火有传》。李致忠先生又请李可染为书籍史展览题扁：“中国古代书籍史展览。”另一路由杜伟生、李炜、李际宁组成，联系陕西、甘肃等省复制相关文物。

戴敦邦（1938—）善用水墨画人物，造诣高，成果丰硕，在画界有很高声誉。本次展览为表现春秋时期孔子删定六经的背景，请他就这个主题创作一幅有孔子形象的图画。本来，这个主题的意境不太好表现，结果，当我们拿到他的画作，都被他所绘孔子形象折服。在他的笔下，苍老孔子的形象，体现了古圣贤的智慧，他一手高高举起毛笔，另一手用微微颤抖的手指，修捻笔毫，好像在疾书中笔锋有毫毛疵出，需要清理。整个画面形象生动，充满动感。

贺友直（1922—2016），善于画连环画，他创作的“汉代造纸流程图”，参考有关造纸术工艺流程，以典籍中所述从漂絮到纸张成形，各工艺环节用连环画形式表现，过程清楚、经典，在展线有限、不能全面详细展开造纸工艺的场景中，这幅连环画起可以起很好的“图解”作用。

仓颉造字，本是传说。但是，画龙点睛在于“薪火有传”一句。范增此画将汉字继承和发展，乃至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，生动地“点”了出来。

杜伟生、李炜、李际宁向西的一路，第一站是西安，在陕西省文物厅的支持下，我们到岐山县文管所联系复制西周甲骨，到扶风县文管所联系复制史墙盘。

展览需要展现早期甲骨文字，本馆有商代甲骨实物，数量和品质尽可以在丰富的馆藏中精选，展览时，原件带到香港，引起观众浓厚的兴趣。

1977年，在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，发现西周建筑遗址，在其中基址的窖穴中，出土西周时期甲骨，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引发学术界热烈讨论。周原甲骨，有一批字迹很小的“微雕”品，要在放大镜下才能看清楚文字。为了展示这个早期文字的最新研究成果，我们几次往返周原和西安，联系藏品单位和复制单位，最后，由复制者用象牙为材料复制了字数相对最多的两件。因为微雕大师复制的时候，有几字刻错了，为此还克减了给复制者的劳务报酬。

在陕西扶风县周原文管所，联系复制了1976年出土的史墙盘。该盘有铭文284个，是1949年以来发现的铭文最多的一件青铜器，对西周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。此次复制，铭文较原盘字体略显单薄，毕竟的翻铸的，字体多少有一点点失真。史墙盘通体散发着深墨绿色光泽，字体浑厚、古朴，我们也有幸摸索掂量了原件，还挺沉。有趣的是，原件铭文下角有一个通透的蚀洞，这可是仿制品没有的标记。据贾双喜说，这件复制品后来曾在某次展览中，因运输包装的问题略有损坏，馆里又重做了一件。目前收藏在书库中的史墙盘复制件，就是这再复制品。

一路向西，5月中旬到甘肃省博物馆，联系复制汉简。随着70年代居延、银雀山、武威等处秦汉简的出土，80年代对简牍的研究趋热。简牍的形制，比如汉简长度、编简成册制度等，是书籍史研究要关注的。为此，我们联系甘肃省博物馆，复制武威出土的《仪礼》长简，又复制30年代居延出土的东汉《永元器物簿》。这中间也有特别要说的趣事，当时甘肃省博还没有开展复制业务，缺少复制技术和材料。后来，他们想了一个办法，解决了复制材料缺乏的问题。原来，70年代中期，甘肃省文物部门在居延一线挖掘，得到许多白茬木简，由于一直埋于干旱的沙漠中，这些木简就如新削出来的新简一般。此次复制，省馆干脆就使用几根，为我们复制了这件《永元器物簿》。如今，这件复制品还在展览中常常陈列。

为展览做的复制品，有多件是由中国历史博物馆协助制作的，其中包括春秋战国诸子代表人物的头像，有毕昇像，有依据《梦溪笔谈》记录的毕昇做泥活字的检字盘，依据王祜《农书》中记载的“木活字检字盘”。这些人物形象，是历史博物馆筹备时期，经过专家学者共同审定过的样式，算是有出处吧。

复制品中，还包括在故宫复制的两件有铭文青铜器，一件簋，一件匜，这两件复制品的水平可就比较高了，也是后来展览中常常使用的摆件。

展览陈列的古籍，是普古、善本和各组特藏中临时抽用的，往往是本馆副本较多、或零

本、后印本等。另几册诸子著作，多半是普古的零本，提出来与展览品放在一起，也是为展览方便而已。

1985年香港书展大获成功。陆本瑞的文章写道：“在这次展览会上，有几项活动比较吸引眼球。”其中之一，就是“中国古代书籍史展览”。“这个展览是由中国版协委托北京图书馆（现为国家图书馆）组织书史专家精心设计策划的，他们本着高标准、高水平、高质量以及学术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相结合的原则，通过图片、文字和实物，介绍中国文字起源、演变以至书籍的产生和发展。展品中有不可多见的甲骨文原件和各种装帧形式的宋、明刻本。展示了中国发明雕版活字印刷术和造纸术，使书籍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。观众反映，踏入这个展览，颇有置身于小型博物馆的感觉。”

香港书籍史展览距今已过去三十多年，这些为当年展览而做的复制品，因人员更替，管理者或已不了解原来的情况。今回忆如右，或许有一点用吧。

参考资料：

- 1.陆本瑞：《蜚声香港的一次文化盛会——亲历一九八五年“中国书展”实录》，《出版史料》2012年第1期。
- 2.杜伟生：《记中国古代书籍史展览》，《图书馆学通讯》1986年第2期。